

现代学校管理

乔春洋 编著

羊 城 晚 报 出 版 社
广 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现代学校管理/乔春洋编著. —广州: 羊城晚报出版社, 2002.9
ISBN 7-80651-161-X

I .现... II.乔... III.学校管理 IV.G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39502 号

现代学校管理

Xiandai Xuexiao Guanli

出版发行/ 羊城晚报出版社 (广州市东风东路 733 号 邮编: 510085)

发行部电话: (020) 87776211 转 3824

出版人/ 张唐生

经 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湛江日报社印刷厂(湛江市赤坎康宁路 17 号 邮编:524049)

规 格/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 9.75 字数 270 千

版 次/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 000 册

书 号/ ISBN 7 - 80651-161-X/G • 32

定 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发现因印装质量问题而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

初稿起始于 1995 年春，驻笔于 1997 年秋。之后做些修改（2000 年又补充了两章），到出版时已是 2002 年夏。区区二十余万字，跨越了两个世纪。条件捉襟见肘，困难就可想而知。

现在总算要出版了，甚幸，甚幸。

书稿采撷前人的理论精华而为营养。在写作与出版过程中，又得到了管理专家樊志强、肖秀全、罗文贵，特别是王文洋博士的大力支持，不胜感激之至。

平时想说的许多话都在书里说了，更多的话留待与读者交流后再说吧。

是为序。

编 者

目 录

一、学校及其管理的发展历史	1
1. 学校的产生与发展	1
2. 学校管理小史	11
二、管理理论介绍	17
1. 管理的含义	17
2. 管理理论的发展简况	19
3. 管理理论介绍	20
4. 管理原理	33
5. 管理失败的原因	37
三、学校管理原则	42
1. 学校管理原则的制定	42
2. 方向性原则	43
3. 民主性原则	44
4. 教育性原则	45
5. 规范性原则	47
6. 教学为主原则	48
四、学校组织机构	50
1. 学校领导体制	50
2. 学校组织机构	51
3. 学校领导班子的合理结构	53
4. 校长负责制	55
5. 校长	57
五、德育管理	60
1. 德育的任务	62
2. 德育的内容	62

3. 德育的原则	66
4. 德育的方法	69
5. 德育管理	74
6. 政教处	76
7. 政教处日常工作	76
8. 政教处主任	81
六、教学管理	82
1. 教学	82
2. 教学方法	83
3. 课堂教学	86
4. 课外活动	89
5. 现代教学与教学改革	90
6. 教学管理系统	100
7. 教学质量管理	102
8. 教学常规管理	108
9. 教师管理	110
10. 教导处	114
11. 教导主任	116
七、总务管理	118
1. 总务管理的任务与内容	118
2. 员工队伍建设	119
3. 财务管理	120
4. 财产设备管理	122
5. 水电管理	124
6. 生活管理	125
7. 校园管理	126
8. 总务主任	128
9. 校办企业	129
八、体育卫生管理	132
1. 体育卫生管理的内容	132

2. 体育课教学管理	134
3. 课外体育活动管理	136
4. 体育运动会管理	138
5. 卫生保健管理	139
6. 卫生室	141
九、美育管理	143
1. 美育的意义	143
2. 美育的任务	144
3. 美育的途径和方法	146
4. 内在美与外在美	148
5. 自然美、社会美和艺术美	152
6. 美育管理	159
十、劳动教育和职业教育管理	162
1. 劳动教育	162
2. 劳动教育管理	164
3. 职业教育	165
4. 国外职业教育	167
5. 选择理想的职业	169
十一、班级管理	171
1. 编班	171
2. 班主任与班级管理	172
3. 组织班集体	173
4. 培养优良班风	175
5. 家长工作管理	177
6. 班主任队伍的建设与管理	181
十二、校长办公室	184
1. 办公室职能	184
2. 办公室主任	190
3. 办公自动化	191

十三、学校管理的计划职能	193
1. 计划的含义、特点和种类	193
2. 计划的作用	196
3. 制定计划的依据和程序	197
4. 目标	200
5. 目标管理	200
十四、学校管理的组织职能	203
1. 组织的含义	203
2. 管理幅度与管理层次	205
3. 组织设计与变革	207
4. 建立学校组织机构	209
5. 制定学校规章制度	211
6. 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	213
十五、学校管理的决策职能	215
1. 决策	215
2. 科学决策的基本原则	219
3. 科学决策程序	220
4. 常用决策技术	224
5. 集体决策	228
十六、学校管理的控制职能	229
1. 控制的意义	229
2. 控制的类型	231
3. 控制的基本要求	232
4. 控制的基本程序	233
十七、学校管理的评价职能	236
1. 评价	236
2. 评价原则	239
3. 评价标准与评价指标体系	241
4. 评价的类型	245
5. 评价的程序	247

十八、学校管理的创新职能	250
1. 创新的意义	250
2. 创新的途径	252
3. 工作创新	254
十九、学校管理的领导艺术	258
1. 领导	258
2. 领导类型	260
3. 学校领导艺术	264
4. 学校领导者使用人才的艺术	265
5. 学校领导者运用权力的艺术	275
6. 学校领导者组织会议的艺术	283
7. 学校领导者协调人际关系的艺术	286
二十、私立（民办）学校	291
参考文献	298

一、学校及其管理的发展历史

1. 学校的产生与发展

原始社会，人们为了同大自然作斗争，制作生产工具，获取生活资料，维持种族的生存与繁衍，开始对儿童和青少年进行生产经验、劳动技能、生活规范以及氏族传统制度、宗教习俗的教育，这种教育一般是在生产生活中，通过言传身教而进行的。由于生产力极为落后，阶级对立和国家没有出现，所以还不可能有专设的教育机构——学校。

我国大约自夏代起，确立了私有制，进入阶级社会，阶级压迫的工具——国家初步形成。夏朝是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经济、文化有较大发展，初步具备了产生学校的条件。夏代究竟有无学校，历来说法不一。虽从记载中可以看出，夏朝有“庠”、“序”、“校”3种名称的学校，但缺少可靠详实的资料来证明，我们不妨认为它们是我国早期学校的雏形。殷商时期，统治者不仅建立了学校，而且学校具有一定的规模。西周集前代之大成，汇合各种学校，构成了一套组织比较完备的学校教育体系。西周的学校分“国学”和“乡学”两大系统。“国学”有大学和小学两级，大学又有“辟雍”、“泮宫”两种。“辟雍”是在天子所在都城的大学，“泮宫”是设在诸侯所在都城的大学。小学也有两种，一种是设在宫廷附近的贵胄小学，太子、国子等幼年时进入这种学校；另一种是设在郊区的供一般贵族子弟上学的小学。“乡学”则是完全按照当时地方行政区域规划而设置的，如《周礼》所记：“乡有庠，州有序，党有校，闾有塾”。这些学校都是我国的早期学校，由奴隶制的国家机器垄断，对奴隶主贵族子弟开放，培养维护奴隶制度的各种人才，成为奴隶主阶级统治劳动人民的

工具。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生产力迅速发展，生产关系发生了急剧的变革。新兴的地主阶级在各个领域向奴隶主阶级展开激烈进攻，夺取政权。奴隶制日趋没落，封建制度逐步建立。这一切反映在政治上就是王权衰微，诸侯争霸；反映在学术思想领域，就是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反映在教育上，就是宫廷垄断教育，“学在官府”局面的崩溃，代之而起的是文化下移，各家“私学”广泛兴起。比孔丘稍早一点的郑国人邓析创办私学，前来求学者很多，“民之献衣，襦（短裤）而学讼者不可胜数”（《吕览·离谓》）。《庄子·德充符》篇中讲到鲁国有个断足的人，叫王骀，他也办了私学，“从之游者，与仲尼相若。”春秋战国时，各家各派及其代表人物，按照他们的阶级利益与学派传统，都创办了规模大小不一的“私学”，造就了一批私学大师。根据史料记载：

“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史记·孔子世家》）

“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淮南子·泰族训》）

孟轲“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孟子·滕文公下》）

“田骈在齐，资养千钟，徒百人。”（《战国策·齐策》）

可见当时的私学十分发达，孔丘、墨翟、孟轲、荀况、老聃、商鞅、韩非等是其中的佼佼者，而孔丘创办的“私学”规模之宏大，成就之突出，经验之丰富，影响之深远，在中外教育史上都是最为著名的。他们长期从事教育活动，在教育思想、教育理论上都有光辉的建树。《论语》、《墨子》、《孟子》、《荀子》、《管子》、《吕氏春秋》等典籍中，记载了大量的教育资料、思想和经验，《学记》、《大学》等则是这一时代丰富的教育经验和教育思想的总结，成为世界上最早出现的自成体系的教育学专著，奠定了我国古代教育的理论基础。春秋战国时代私学的创立，使教育从政治中分离出来，完成了学校独立化的过程。它打破了奴隶主贵族独揽教育的局面，扩大了教育对象，使广

大平民子弟有了受教育的机会和权利。从此，在中国的教育史上便出现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学校：官学和私学。

秦始皇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他实行“书同文字”，结束了“语言异声，文字异形”的情况，编写了几种文字课本，如李斯的《苍颉篇》、赵高的《爰历篇》、胡母敬的《博学篇》，作为标准的文字范本，为我国蒙学识字课本之先驱。但秦始皇焚书坑儒，禁锢思想，他不设官学，又禁止私学，“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严重忽视了学校教育的职能和作用，削弱了秦王朝的统治基础，从而加速了秦王朝的灭亡。这一失败的教训为汉代统治者所记取。西汉王朝建立之后，封建统治者为巩固自己的统治，迫切需要培养大批封建统治人才，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的建议，逐渐建立起比较完备的官学制度，为以后历代封建王朝的学校教育制度奠定了初步基础。当时的官学有两种：一种是由封建朝廷直接控制的中央官学，主要有太学、宫邸学和鸿都门学。太学设于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初置博士弟子50人，后能容纳万人，东汉的洛阳太学学生最多时超过3万人，有房屋1850间，规模之大，实属世所罕见。太学是汉代的最高学府，可谓中央官学中的典型代表，它标志着我国封建官立大学制度的确立。而鸿都门学所开设的课程别具特色，主要是辞赋、小说、绘画及书法等，因而被誉为我国乃至世界上第一所文学专科学校，开后世专科学校之先河，在教育发展史上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另一种是由地方政府管辖的，称为地方官学，“郡国曰学，县道邑曰校，校、学置经师一人，乡曰庠，聚曰序，序、庠置经师一人。”（《汉书·平帝本纪》）学、校属中学性质，专攻一经；庠、序属小学性质，注重礼教。学、校的学生有升入太学的资格。无论中央官学，还是地方官学，都没有专职主管教育的行政机构和官员。在中央，教育工作由太常兼管，而地方学校概由各级行政长官负责。另外，汉代私学讲经之风也盛况空前，及门弟子、著录弟子往往成千上万。两汉时期是我国封建教育制度化和定型化的时期，可以说，那时的教育制度是中国封建教育制度的一个雏形，因而，在中国封建社会教育发展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位。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长期封建割据，社会动荡，加之士族子弟有做官的特权，不需要认真学习，故官学时兴时废，总体上趋向衰落，而这一时期的私学却昌盛起来，玄、道、佛、儒诸家并存，学术思想比较活跃。

隋唐时期，由于有长期稳定的政治局面，生产发展，社会进步，特别是唐代，经济、文化、科学全面繁荣，国力空前强盛，加之政府崇儒兴学，重视教育，因而官学比较发达。隋朝在中央设国子寺（后改名为国子监），置祭酒，专门管理学校教育工作，这是我国历史上设置专门的教育行政部门和专门的教育行政长官的开始。唐朝经过百余年的经营和发展，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完备的封建学校教育体系，这在中国乃至世界学校教育制度发展史上，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中央设有“六学”、“二馆”，即：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律学及崇文馆和弘文馆。“六学”直属于国子监，国子监既是高等学府，又是教育行政管理机构，其长官称国子祭酒。崇文馆归东宫直辖，弘文馆归门下省直辖，两者都是最高贵族学校。此外，还设有医学、玄学、集贤殿书院、皇族小学等。地方学校包括府、州学与县学两级，作为统一的学制在全国普遍推行。县以下尚有乡学与市、镇学两级，但不常设。地方学校统归地方政府“长史”管辖。唐朝建立了科技专科学校，颁定了统一的科技专业教材，用多种形式培养科技人才，不仅初创了古代科技教育制度，而且形成了一定的科技教育思想。唐朝学校教育制度的完备，不仅表现在学制系统上，而且还表现在教学管理方面。学校有适合于科举考试的稳定的教学计划，开设了必修科目、公共必修科目和选修科目。学校有各类专职教师，在教学方法上采用分经教授、讲读结合，专科学校重视实际练习。学校还规定了学员的入学资格与手续，规定了考试办法和假期。

宋代的学校教育制度和教育内容基本上是承袭唐制，其中稍有变革和发展。这一时期最值得一提的是产生了一种新型的教育组织形式——书院，它成为自北宋到清代教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书院之名源于唐代，至北宋初年发展成较为完备的书院制度。北宋前期，有

所谓天下六大书院，即：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石鼓书院、应天府书院、岳麓书院、茅山书院。后来北宋三次兴学，官学发展，书院相继衰落。南宋偏安，内忧外患，国运不济，重科举而轻学校，加之选拔官吏不那么严格，官学名不符实，书院又进一步兴盛，如宋宁宗时增设了南岳书院、北岩书院。宋理宗时增建书院约 20 间。书院主持人称山长、堂长或院长，也有叫洞主，一般由博学多才之士充任。书院与官学不同之处在于，学员的等级没有那么明显，可以独立钻研，也可以共同讨论，主持人有一定程度的自由讲学精神，师生关系比较密切，教学与研究互相结合。正因为这样，学术空气及教育思想空前活跃，理学与理学教育迅速发展，出现了诸如胡瑗、张载、程颐、程颢、朱熹、陆九渊等著名的教育理论家和教育改革家。

元代学校的设立因民族关系而颇具特色。中央官学设有国子学、蒙古国子学和回回国子学 3 种，由“大司农司”（《元史·百官志》）掌管。其中的回回国子学教授波斯文字，为政府机构培养翻译人才。地方官学，除按行政区划设立的路、州、府、县、社学之外，还设立了具有民族特点的专科性质的诸路医学、诸路蒙古字学和诸路阴阳学。元代地方基层组织 50 家为一社，规定每社立一学校，择晓经书者为学师，农闲时使弟子入学。社学的设置，是元代在教育上的一项重要措施。

明朝时，政府先后在南京和北京设立了国子监，在地方设立府学、州学、县学及卫学，这些都是官学。明太祖在恢复官学之后，觉“乡社之民，未睹教化”，乃于洪武八年（公元 1375 年）下诏建立社学。

清代的官学和明代大致相仿，只是清代的府、州、县、卫学在嘉庆之后便有名无实。私人办学到了清代，其盛况超过以往任何朝代。私人办的学校统称“学塾”，学塾又有“教馆”（坐馆）、“家塾”（私塾）、“义塾”（义学）之别。塾师受有钱家庭之聘而前去教书的叫“教馆”或“坐馆”，塾师在家设馆招生授徒的，叫“家塾”或“私塾”，由地方人士或公堂之类捐资，请塾师在公共地方教授贫寒子弟的，叫“义塾”或“义学”。

书院在明初近百年间归于沉寂凋零，成化年间渐渐兴起，至嘉靖极盛。但中央极力加强专制统治，将书院纳入官学化的轨道，对不能纳入官学化轨道的书院进行查封和禁毁。于是，嘉靖后出现了4次禁毁书院的举动。清初90年间，官府对书院采取抑制政策，雍正至乾隆，因政府提倡，书院的发展又超过前代，不过此时的书院已成为官学的一种形式。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后，朝廷内外的有识之士，已觉西艺之重要，于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在上海创办了“格致书院”，王韬任监院。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河北书院设经义、治事两斋：经义斋的课程有经学、理学、词章、绘制及中国古代算学；治事斋开设西洋算学、方言、格致（物理、化学等学科的统称）、律法、制造、商务、水陆兵法、舆地测绘等课程。由此可见，书院迫于形势所需，已悄悄地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了。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处于列强环伺，朝不保夕的危险局面。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些官僚面对这一“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的严峻形势，发起了“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奕䜣、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等人是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他们认为，要抗御外敌，富民强国，必须造就人才，必须改变“所学非所用”的传统教育。于是开办洋务教育，设立“洋务局”，广泛兴办各种类型的新型学校，并且大量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作为教学的主要内容。这些新型学校主要有4类：第一类是外国语学堂，如京师同文馆（1862年）、上海广方言馆（1863年）、广州同文馆（1864年）、武昌自强学堂（1894年）等。第二类是军事学堂，如天津水师学堂（1881年）、天津武备学堂（1885年）、广州水师学堂（1865年）等。第三类是技术学堂，如上海江南制造局附设的机器学堂（1865年）、福建船政学堂（1866年）、上海电报学堂（1882年）等。另外一类是综合性学堂。尽管洋务教育最终随洋务运动的失败而告破产，但它毕竟是对封建传统教育的重大改革，无论是教学内容还是教学方法都有不少改进。洋务教育兴办了一批新式学校，在客观上促进了我国近代学校的发展，传播了近代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对培养我国早期的科技人才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1895~1898 年，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并领导了旨在变法图强的维新运动。资产阶级改良派极其重视教育在改造社会和培养人才方面的重大作用，“国势之强弱，系乎人才；人才之消长，存乎学校”，他们提出在中国建立资本主义学校教育体系。由此出发，改良派在维新运动中创办了近百所新式学校，其中最有名气、影响最大的是康有为创办的“万木草堂”（广州）和谭嗣同等人发起、得到维新派地方官赞助的“时务学堂”（湖南）。

辛亥革命时期，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致力于武装斗争的同时，努力发挥教育的作用，主张通过教育去启发民众的觉悟，唤起民众的革命热情，培养革命人才。在这些思想指导下，革命派创办了很多新型学校，比如中国教育会蔡元培、章太炎等在上海创立的爱国学社，蔡元培、蒋观云创办的爱国女校，光复会成员徐锡麟、陶成章在浙江绍兴创办的大通师范学堂……

1902 年，清政府公布了《钦定学堂章程》（即《壬寅学制》），这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最先制定的系统的学校制度，因不够完备，没有实行。1903 年，张百熙、张之洞、荣庆又受命重新拟定了《奏定学堂章程》。清政府于 1904 年 1 月正式公布这一章程，并令在全国施行。因公布之时正值癸卯年，故这一章程又称为《癸卯学制》。这个学制把整个学程分为 3 段 7 级共 26 年，是我国学程最长的一个学制，它包含着从小学到大学的整体体系。《癸卯学制》从公布起一直施行到 1911 年清朝灭亡，它是中国教育史上最早颁布并在全国施行的具有资本主义色彩的新学制，为中国现代学校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于 1912 年公布了《学校系统令》，即《壬子学制》。第二年（癸丑年），又陆续颁布了各种学校规程，对《壬子学制》作了补充和修订，从而综合成一个更加完备的学制，即《壬子癸丑学制》。首先，它废除了“忠君”、“尊孔”、“读经”的封建教育宗旨，反映了发展资本主义政治与经济的要求，是资产阶级教育反对封建主义旧教育的一次重大胜利；其次，它扩大了女子受教育的权力，规定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校，普通中学、师范学校、高等师

范学校和实业学校皆可设立女校；第三，取消了专门为贵族子弟设立的贵胄学校，废除了封建特权和等级制度；第四，它缩短了学制年限，客观上增加了劳动人民享受教育的机会；第五，它改进了教学方法，反对体罚学生，主张教育要联系儿童实际，适合儿童身心发展的特点。所以，《壬子癸丑学制》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1922年11月1日，北洋政府以大总统令公布了《学校系统改革案》，是为“壬戌学制”，也称“新学制”或“六三三制”。《壬戌学制》缩短了小学修业年限，延长了中学修业年限；重视学生的职业训练和补习教育；课程和教材内容侧重于实用；实行选科和分科教育，兼顾学生升学和就业两种准备。1922年的学制改革借鉴了美国的“六三三制”，针对我国实际进行了长期酝酿和集思广益，是我国“五四”运动以来教育改革的一个综合成果，对我国当代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

1919年到1949年，现代30年间，中国的学校教育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

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力地推动了现代初期的教育改革，以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的知识分子在教育改革中起到了先锋作用，他们倡导民主科学教育，提倡白话文教学，主张在教育上男女平等。1917年提出推广女子教育案；1920年，北京大学首次招收女生，随后不少大学效仿，并开始实行男女同学。一些进步的中学也同时兼收男女学生，并实行男女同班制度。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我国新教育制度的建立与发展有了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同时，十分重视教育的作用，积极创建教育机关，培养革命人才。1924年，国共两党实现首次合作，共同制定了教育政策，拟定教育发展计划，整理学制系统。为了培养军事指挥人才，迅速结束军阀割据状态，促进革命形势的发展，国民政府还创办了中国国民党黄埔陆军军官学校。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合作破裂。当时的中国同时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教育，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新民主主义教育和国民党统治区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教育。在革命根据地，共产党十分重视军队教育和干部教育，重视各类人才的培

养，先后建立了红军大学、红军步兵学校、红军特科学校、游击队干部学校、红色医务学校、中央农业学校、高尔基戏剧学校、高级和初级师范学校等。社会教育的重点是识字和扫盲，为了培养“共产主义建设的新后代”，对儿童实行免费义务教育，从而使儿童的入学率大大提高。据统计，到 1934 年，江西、福建、广东省苏区根据地的 2 932 个乡中，有列宁小学 3 052 所，学龄儿童多数都能免费入学。在国民党统治区，国民党实行其所谓“三民主义”的教育方针，对广大人民和青少年儿童实行所谓“党化教育”，学制上大体沿用了 1922 年的“六三三学制”，在教学方法与教学改革方面，借鉴西方教学改革实验、智力测验和教育测验，推行设计教学法和实验道尔顿制，改教授法为教学法，开展各科教学的实验活动。另外，还广泛开展乡村教育，影响较大的活动有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农村改进实验、陶行知创办的乡村师范和山海工学团、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的定县试验区、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等。国民党统治区教育在性质上属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其宗旨是为国民党培养“忠臣”与“顺民”，但就具体的教育教学方法、改革与实验而言，也积累了不少有益的经验，存在着不少积极因素。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共中央提出在解放区实施“国防教育”、“实行抗战教育政策，使教育为长期战争服务”的教育方针，在抗日根据地继续实行干部教育、成人教育和儿童教育。解放区相继开办了许多干部学校，如中央党校、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文学院、中国女子大学、华北联合大学、延安自然科学院、延安大学等高等学校和鲁迅师范学校、边区中学等中等学校。在成人教育方面，通过识字班、宣讲班、技术训练班广泛开展扫盲运动，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办学形式灵活多样，有冬校、夜校、半日校、星期日学校等。与此同时，还普遍开展小学教育，重视“以民族精神教育新后代”，实施儿童教育的机构主要是列宁小学（或劳动小学）。在国民党统治区，国民党政府实行了与其抗战原则相一致的教育措施，颁布了抗战教育方针，使大批高校内迁，保存师资力量，保证高等教育继续进行。成立国立中学，安置沦陷区